

们就把英语变量去除之后重新进行了分析,发现教育程度又显著了,教育程度和英语水平有很大的相关性。

一个比较奇怪的结论是,对亚裔男性模型来说,性别比应该是正向影响,如果在自己族内找不到匹配的女性结婚的话,应该更多转向族外。但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婚姻市场中,我们的理论推测失效了呢?后来我们进一步做了分析,发现原来很多亚裔男性更多会选择回原国、回原籍地,找自己婚配的女士带到美国去。我们确实也发现了大概有28%的人,他们的妻子在结婚当年,或者结婚之后才到美国,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去考察了一下亚裔女性的因素,还是负的,这确实对她们是有影响的。如果是女性,出现了找不到相匹配的男性,因为女性多、男性少,她们是从美国当地婚姻市场找匹配的对象,更多的是族外婚,但是对男性来说有其他的策略,比如从国内搬运。

如果我们用数据分析,可以看到通婚的比例在提升,同一个现象可能有不同的机制。一个是人口本身的机制,因为人口本身可能会发生变化,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造成通婚率的变化。另一个可能是人口通婚偏好的变化,即社会融合的影响。我们需要去分析具体产生作用的机制。

跨国“圣战”分子与中东政治变迁

田文林*

中东地区的情况比较特殊。世界对中东地区的关注,首先不是它的经济发展,而是安全形势。在中东最突出的跨国人口流动不是难民问题或移民问题,而是跨国“圣战”分子问题。前几年“伊斯兰国”最活跃的时期,来自全球各地的“圣战”分子纷至沓来。仅仅在叙利亚,就有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的3万多名极端分子。这些极端分子来自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伊斯兰国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美欧发达国家。在此之前,1979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同样是全球各地的“圣战”分子赶赴阿富汗,参加反抗苏联的“圣

*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战”。穆斯林跨国“圣战”，已经成为中东政治中非常独特的一道风景。

一 产生原因

中东地区的跨国“圣战”问题为何如此显著？

首先是宗教—历史原因。公元7世纪，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之前，阿拉伯半岛四分五裂，部族仇杀不断。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以后，建立了基于共同信仰的“乌玛”（穆斯林共同体），该组织的口号就是“穆斯林皆兄弟”，其超越了部族、血缘等传统的狭隘界限，因此焕发出巨大生命力。正是凭借这种独特的政教合一模式，穆罕默德和随后的“四大哈里发”在短期内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并最终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这一辉煌历史令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群众记忆犹新，缅怀不已。在他们看来，强化信仰、团结穆斯林民众是应对一切挑战的先决条件。因此，在历史上，阿拉伯世界每逢遇到重大外部挑战，总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从宗教中寻求自我救赎的办法。

进入近代以来，在西方的殖民侵略和“委任统治”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被分化肢解，变成了类似于欧洲的主权国家体系。该体系是欧洲殖民者人为制造的结果，没有考虑中东各地的自然历史情况，因此很多穆斯林不接受这个外部强加的地区体系。许多穆斯林更是从宗教角度否定现行体系，他们认为“主权至上”的观念有违伊斯兰教倡导的“真主至上”的观念。另外，地缘碎片化也让中东国家无力抵抗欧洲或其他外部列强的欺凌。这些人一直有个情结，希望伊斯兰世界在宗教大旗下再次团结起来，乃至重新建立“穆斯林共同体”。

所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设法使阿拉伯民族或者广大穆斯林重新团结起来的想法始终没有泯灭过。20世纪50、6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风靡中东，该运动强调“阿拉伯民族”认同，主张整个阿拉伯世界团结联合，乃至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该运动失败后，中东地区自70年代开始，又出现了伊斯兰复兴运动。既然民族认同难以落实，就转而强化宗教认同，强调伊斯兰统一。该进程同样没能有效实施，但作为一种共同记忆和意识形态，伊斯兰认同根植于很多穆斯林心中。只要外界出现风吹草动，就会拨动“穆斯林团结”或跨国“圣战”这根敏感神经。所以，近几十年来，只要中东哪个地方出现战乱，

无论是外部列强入侵，还是当地世俗政权出现统治危机，总会有人起来号召民众，赶走外来侵略者或推翻当地统治者。这是导致中东出现跨国“圣战”分子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发展不平衡。从世界范围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下，世界各国之间、各国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伊斯兰世界的经济边缘化情况最为明显。从经济水平看，根据2014年各国GDP排名，除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勉强入选G20外，伊斯兰世界57个国家中，位于20至50名之间的有8个，50名至100名之间有17个，101名至178名有16个，伊斯兰世界基本处于欠发达状态。从安全形势看，根据非营利组织“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14年全球和平指数(GPI)报告，在位列世界上最危险的十大国家中，有6个是伊斯兰国家(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苏丹、巴基斯坦)，而西亚、北非作为伊斯兰世界核心区，是世界上动荡与冲突最严重的地区。因此，相比于东方儒家文化圈和美欧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整体处于十分困难的局面。

这种发展不平衡导致国家间、地区间以及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我们常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发展滞后很容易滋生极端情绪，导致国家动荡。国家一旦动荡，又很容易成为极端分子蔓延的溃疡面。在中东地区的很多国家，像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都是在政局动荡或政权垮台的过程中，各国极端分子蜂拥而至，将这些国家作为复兴伊斯兰大业的“孵化园”。

第三个原因是对西方挑战的应战。在近代之前，伊斯兰世界与欧洲基督教世界实力旗鼓相当，甚至一度处于主动地位。当年的阿拉伯帝国，以及后来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都曾入侵到欧洲的心脏地带，并一度令欧洲人谈伊斯兰色变。然而，自近代以后，欧洲凭借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强大军事优势，在与伊斯兰世界的对决中日趋占据压倒性优势。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挑战，伊斯兰世界节节败退、处境被动。自近现代以来，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地区比中东地区遭受了更多外来干涉和霸权欺凌。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共发动了五场地区战争，即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海湾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四场战争在伊斯兰世界，三场战争直接针对阿拉伯核心国家。因此，相比于世界其他地区，伊斯兰世界是危机感、焦虑感最明显的文化板块。面对来自异域的严峻挑战，伊斯兰世界曾经奋起反抗，通过各种方式尝试实现复兴。例

如，尝试过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复兴、通过政治联合反对外来欺凌，但这些尝试都不是很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中东的当权者帮助穆斯林实现复兴梦想、恢复昔日荣光，根本是不可能的。中东国家的反抗主体日渐从国家下降到个人层面，也就是通过人自为战，谋求在困境中突围。像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这种人，不仅仅是外界常说的恐怖主义头目，他还有一整套改造和复兴伊斯兰世界的大胆想法。他要对付的敌人，既包括中东的世俗政府这一“近敌”，也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这些“远敌”（拉登的设想是重点对付美国等“远敌”），并在打烂旧世界的基础上，最终建立一个类似古代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时期的新世界。

2014年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相当于“基地”组织的2.0版。该组织不同于“基地”组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恐袭做法，而是公开开疆拓土，建立实体的“伊斯兰国家”。按照“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的设想，其最终是建立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乃至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哈里发帝国”。可以说，正是这种梦幻般的宏伟蓝图，激励着一代代跨国“圣战”分子在伊斯兰地区到处游走，寻找栖身地和突破点。

二 影响评估

那么，中东的跨国“圣战”分子到底给中东政治变迁带来了什么影响？用一句话评价，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些跨国“圣战”分子不可能给中东伊斯兰国家真正带来什么正面效应和“正能量”，相反，它们更多带来动荡和灾难。

首先，它给中东相关国家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这是因为，跨国“圣战”分子的首要目标就是想方设法颠覆本国政府。在极端分子看来，中东的民族国家体系本来就是非法的，世俗主义违反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模式。因此，哪怕是像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这种深受民众支持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他们也进行批判乃至试图暗杀。为了打击本国政府，极端分子经常专门绑架乃至杀害外国游客，以打击相关国家的旅游业。此外，极端分子还经常有意识地破坏石油管道设施，同样是为了摧毁相关国家的经济命脉。换言之，这批力量完全变成了中东政

治的搅局者和颠覆者。2011年中东剧变后，随着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出现动荡，这批跨国“圣战”分子再次蜂拥而至，将原本祥和稳定的两个国家搅得沸反盈天。卡扎菲统治时期，利比亚原本是非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富裕国家，但现在却四分五裂，三个政府同时并存，大量民众无家可归，乃至流亡海外。叙利亚的巴沙尔政府虽然没有被跨国“圣战”分子推翻，但在这些极端分子搅局下，造成叙利亚恐怖袭击频发，数十万人员伤亡，整个国家经济至少倒退三四十年。

其次，从国际上看，用恐怖主义手段反对霸权主义，最终不仅没有有效打击对手，却招来了更大的报复。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将伊斯兰世界遭受的苦难归咎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于此，“基地”组织将美国相关目标作为首要打击对象。他们发动“9·11”恐怖袭击事件时，有个基本逻辑就是，1982年极端分子在黎巴嫩用汽车炸弹炸死两百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结果美国在压力下直接从黎巴嫩撤军。1993年，美国特种部队在索马里开展抓捕军阀艾迪德(Maxamed Faarax Caydiid)的行动，结果两架“黑鹰”直升机被击落，19名美国士兵死亡，美国由此很快撤出索马里。所以，本·拉登等人想通过给美国制造更大人员伤亡，迫使美国撤出中东。

但问题在于，“基地”组织是在美国本土制造恐怖袭击，并造成超过3000人死亡。美国报复心极强，且早有控制中东的想法，因此以“9·11”事件为借口，加大了对中东的军事介入，并由此给中东伊斯兰国家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短短数年内，美国先后在中东发动了两场反恐战争。这两场战争让美国软硬实力严重受损，但中东国家受到的损害比美国大得多。伊拉克原本是中东和平绿洲，但战争使伊拉克由治到乱，教派矛盾升温、恐怖袭击频发，平民大量伤亡，基础设施严重被毁。某种程度上，伊拉克已经变成“失败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改造”战略，扶植西式民主，结果因水土不服，造成更多问题。

由此观之，跨国“圣战”分子在中东的四处活动，更多是作为搅局者存在。他们没有给中东政治变化带来什么“正能量”，反而给中东留下“一地鸡毛”，造成更多后患。

三 结论

中东跨国分子的出现，实际上是中东地区特定的宗教—历史背景、现实境

遇、外来挑战合力作用的结果。这股力量是中东地区应对重重挑战的应激性反应，也可以说是“绝望中的反抗”。但必须指出的是，中东面临的困境更多是结构性问题，因此需要通过结构性调整的办法解决，通过极端恐怖手段解决结构性问题，是南辕北辙，只会适得其反。

西方学界关于自由迁移的争论述评

田方萌*

什么是跨越国界的自由迁移？如果不用办理护照签证，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也没有居住时限，人们就实现了自由迁移。美国的盖洛普调查公司最近几年做过一项全球调查，问各个国家的居民是否想永久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如果想的话是哪个国家。结果表明，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属于主要目的地，非洲、中东、中亚基本上没人去，中国和印度在这之间。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可以计算出有多少人想移民到发达国家，保守估计也有两、三亿人。现实中有多少人能移民到这些国家呢？2008—2017年，每年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能吸纳的移民数量大约是四五百万人，这还包括了欧盟内部的迁移数量，非OECD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数量可能也就两三百万。也就是说，今天想移民到发达国家的人，如果都能实现移民梦，排队得排一个世纪。对于世界上很多人来说，渴望移民到发达国家的愿望和发达国家把他们拒之门外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在西方学界不是没有人思考和讨论。《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说了两点，一是人们在各个国家内有居住迁移的自由，二是人人有权离开各个国家，但是没有说人人有权进入其他国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些西方学者开始主张发达国家应该把门开得更大，让更多移民进来，我们可以将他们称为“开放论者”。开放论者的论述在学理层面已经达到成熟的程度，至少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他们呼吁建立一种移民体制，允许不同程度的自由迁移，但都要比今

* 田方萌，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